



ULSZ3094 Project 2

论贺淑芳《蜕》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

The Trauma of Chinese and Malay Character and Imagery Writings of  
Malaysia 13 May Incident in Ho Sok Fong's *Tui*

TAN CHING

陈靖

19ALB0643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4

#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1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3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6
第四节、研究范围.....	7
第五节、研究方法.....	8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11
第二章 梭子之声：《蜕》华巫人物创伤书写.....	12
第一节、外在创伤：罹难者与幸存者.....	13
第二节、内在创伤：无法痊愈的伤痕.....	16
第三节、小结.....	22
第三章 作者之身：《蜕》意象书写.....	24
第一节、人物意象.....	25

第二节、动物意象.....	28
第三节、小结.....	32
第四章 结语.....	34
参考文献.....	35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陈靖 Tan Ching

学号：19ALB06439

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论文题目：论贺淑芳《蜕》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

学生姓名：陈靖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马来西亚属于多元民族国家，1969年5月13日不幸于西马地区爆发“五一三事件”，使华巫两族人民遗留下严重的外在和内在创伤，政府对事件过于单一的解释，也使华巫两族的记忆产生区别，直接导致了关系之间的不和谐。“五一三事件”是马华文学中重要的创伤叙事资源，本论文将运用文献调查法、文本细读法、社会历史批评法、文学创伤理论研究法和读者批评法，结合资料与自身的思索，以贺淑芳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蜕》为重心，探讨其中“五一三事件”的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笔者将《蜕》中的华巫人物创伤书写分为三小节，一是探讨小说中人物的外在创伤，分别由罹难者友梅、叶金英娘家人、贾米尔兄长等以及幸存者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等组成，揭露人物在事件中面临的可怕遭遇；二是探讨人物的内在创伤，分别由幸存者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雅各等组成，书写内在创伤的症状，反映出创伤无法痊愈且具有延续性，幸存者并未真正逃脱死亡的追逐；三是小结，主要尝试梳理贺淑芳创伤书写的原因、意义和价值，指出言说创伤才是走向疗愈的正确方法。意象书写也分为三小节，一是探讨小说中的特殊人物意象，分别由未、半边人、杜丽娘组成，反映出国家对真相的封锁，使作者需要艰辛重组历史，也导致人们的创伤无从治愈，或许只有在梦中才能解决；二是探讨动物意象，分别由虱子、青蛇、蝴蝶、

螃蟹和蜘蛛等小说标题的取名组成，揭露它们似乎隐喻着国家对创伤的处理方式，决定着国家、种族、关系之间是蜕变成功或残败；三是小结，主要总结意象的作用。笔者认为《蜕》的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叙述线一是作者塑造了虚构的家庭来重组事件，成功为人们缝合了碎裂的“五一三事件”；叙述线二是作者以梦、剧场、魔幻等处于逻辑线外的方法来表达主题和创伤，二者融合了作者的个人审美，使一个原本支离破碎、不见原貌的事件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体”（文本）。

## 关键词

贺淑芳；《蜕》；“五一三事件”；华巫人物创伤书写；意象书写

## 致谢

时光飞逝，转眼间竟已走到大学尾声。从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舍不得大学生活、想念大学生活，十四周赶接近十二份报告的日子，有什么好怀念的呢？现在却好像有点明白了，原来是怀念作为学生的自己，怀念和一班好友相聚的时光，怀念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更怀念不必为一地鸡毛烦恼的日子。然而现实是，人就得向前走。此时此刻的我，对生活了近五年的金宝感到极为不舍，也怀抱着对未来的担忧和憧憬，但愿拉曼大学所给予我的宝贵知识和成长经验，能够为我换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未来。

衷心感谢所有曾帮助过我的人，包括老师、家人和朋友。第一份致谢要献于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感恩您在我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建议和鼓励，多亏有您的耐心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论文。其次，感恩一路给予我无限支持的家人们，感谢父母的无私，支撑着我持续前进，也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给予我各种意见的展学。最后，也要感谢每一个曾给予我帮助的朋友，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只能特别感谢我近四年的老搭档佩丽，真的很怀念跟你一起完成报告的“安全感”。当然还有最善良乐观的彩莹和靖萍，很开心能够认识你们，你们让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了珍贵的回忆，真心愿即使毕业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依旧不散。

# 第一章 绪论

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华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退失据，政府颁布的“马来人特权”影响了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马华文学也随之被迫退至边缘性地位。之后，越来越多马华作家选择到国外求学，而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他们开始尝试改变马华文学的生存状态。因心中长期积聚着敏感的种族问题，拥有开阔文化视野的新生代作家，以解构的方式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进行批判性重估。马华新生代作家醉心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他们拒却历史宏大叙事，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官方）的历史叙事，尝试去重构大马华人被压抑、掩盖的“真历史”，而马华作家——贺淑芳便是其中之一。《蜕》将目光聚焦于历史事件，即“五一三”中的小人物，拒绝官方支配的历史叙事，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切入，从细节去发掘渺小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悲欢离合、命运走向，认为如此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贺淑芳于《蜕》中书写历史、大马华人真正的境遇，试图以隐形的姿态去反抗政府的压制。<sup>1</sup>

##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1970-）在吉打双溪里茂出生，曾担任《南洋商报》专题记者、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等。2002年，她以荒诞情节设置并尖锐反映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紧张的〈别再提起〉受到瞩目，获得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也由此进入大众视野。贺淑

---

<sup>1</sup> 蒋成浩，〈马华文学的历史流变与“关键词的阐释边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页131-133。



芳笔下的作品共有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2012）、《湖面如镜》（2014）<sup>2</sup> 以及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蜕》（2023），《蜕》更是获得了首届的台湾国艺会马华长篇小说创作补助<sup>3</sup>。

《蜕》历经三年多才完稿，小说原题为《繁花盛开的森林》，临出版前才改为《蜕》，如此的再三斟酌足以见作者的重视程度。<sup>4</sup> 从 2002 年〈别再提起〉中的华巫族群关系和直达讽刺效果的粪便意象，乃至 2023 年《蜕》中的“五一三”华巫人物创伤和各类隐喻创伤的意象，可见贺淑芳的作品一直以公共议题为主。摆脱了字数的限制，长篇小说《蜕》比短篇小说〈别再提起〉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和意象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其以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为核心内容，将故事时间轴心设置在 1969 年 5 月 13 日，并以吉隆坡为空间坐标来叙述华巫人物的创伤。《蜕》后记中提及，触发“五一三”的事因极其荒谬，起因是一名华裔小孩在文良港被杀害，但消息传至马来甘榜时，被杀的华裔小孩竟变成了马来小孩。于是，人们沉浸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悲情中，暴动在消息以讹传讹的情况下席卷整个吉隆坡。<sup>5</sup> 从马来西亚第三届全国大选开始，西马地区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冲突持续了约两周。<sup>6</sup> 当时的马来西亚官方数据显示，暴动期间有 196 人丧命，180 人受枪伤，259 人被其它武器致伤。然而柯嘉逊指出，事件中的死伤人数实则远超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官方不仅有意欺瞒真实的伤亡人数，甚至刻意模糊受害者的种族成分，事实上暴乱中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华族。<sup>7</sup>

---

<sup>2</sup> 刘雯慧，〈镜子映照的表/背面：论贺淑芳的小说〉，《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369。

<sup>3</sup> 贺淑芳，《蜕》（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页 9。

<sup>4</sup> 贺淑芳，《蜕》，页 10。

<sup>5</sup> 贺淑芳，《蜕》（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23），页 5。

<sup>6</sup>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页 135。

<sup>7</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八打灵：人民之声出版，2013），页 7-8。

“政治幽灵”——贺淑芳是这般称呼“五一三”的。事件后，马来西亚就严禁人们讨论这段历史，国家档案局也将相关资料封锁。不愿公开，不允许讨论，现场已逝去，彼此记忆中的黑色历史，真实存在，却看不见。政府将事件爆发的一切责任归咎于反对党在胜利游行时，行为举止过于嚣张，惹怒了马来人。<sup>8</sup> 然而根据柯嘉逊的说法，1969年5月的暴乱事件，并不是马来西亚官方所谓“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它是经过策划和组织的。“五一三事件”实则是当时新兴的马来官僚资产阶级，为推翻他们眼中“落后”的马来贵族（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引发的一场政变，暴乱成了宣布紧急状态、新政权进行政权替换的最佳借口。<sup>9</sup>

贺淑芳生于1970年，显然她并不是“五一三”的亲历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在五十余年后，决定再度书写有关事件的文学作品？在笔者看来，“五一三”属于真空的历史事件，《蛻》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贺淑芳以虚构的方式去书写匮乏的资料，尽最大的可能以不同的视角去补充缺漏的面向，<sup>10</sup> 使人们得以稍微探得隐讳的“五一三事件”。

##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蛻》是2023年8月10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意味着截至目前为止相关资料极少，笔者至今并没寻找到有关《蛻》的华巫人物创伤和意象书写的前人研究。因此，本篇内容中，笔者只能尽量搜寻能够进行挂钩的资料，以类似研究方向的书籍、学位论文或期刊论文等，作为前人研究回顾的参照。

---

<sup>8</sup> 贺淑芳，《蛻》，页298。

<sup>9</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页2-3。

<sup>10</sup> 贺淑芳，《蛻》，页298。

《蜕》的核心内容是“五一三事件”，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必然绕不开它。笔者收集了一些有关事件的资料，如柯嘉逊的《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此书为人们解密了被马来西亚官方封锁的真实资料，还原了“五一三”的真实面貌，填补了事件的空白。以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官方将暴乱原因全数归结于反对党，称暴力事件是自发的，但书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一三”经过精心策划，并给予了各种证据，为人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sup>11</sup>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也是本论文的参照资料之一。书中记载了“五一三”幸存者、亲历者们的口述证言，为人们了解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让这段历史记忆得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记录、延续。<sup>12</sup> 打个比方，书中的〈追求〉章节以“五一三”亲历者的视角写成，口述者透露出了事件发生的现场情况，如他亲眼见证，马来人焚烧华人区的排屋，人体的烧焦味弥漫在空气中整一个多星期。<sup>13</sup> 不止是华族受害者，书里〈观察〉的章节中也有提及华族在攻击巫族，如口述者在联邦戏院看见有手持刀子和铁条的华裔攻击一对误闯前门的马来夫妇。<sup>14</sup> 除了亲历者，也有“五一三”参与者的口述。〈内疚〉中的口述者被迫加入事件，他亲眼见证了华人小男孩被故意杀害，河上漂流着华人、印度人的尸体，也曾亲自从河里捞起马来人的尸体。<sup>15</sup> 当然，书中也并不缺“五一三”罹难者的家属口述，如〈辍学〉和〈身高〉中，罹难者林金展的死体现出了事件中幸存者的情况。无论是罹难者母亲无法控制的情绪和眼泪、大哭大闹导致差点眼盲，还是妹妹在往后每一次大选前的囤米买盐，一切都体现出了幸存者们的遗留的创伤，<sup>16</sup> 而这些例子都将

---

<sup>11</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2-3。

<sup>12</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八打灵：文运企业，2020），页 8-11。

<sup>13</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39。

<sup>14</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46-47。

<sup>15</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56-63。

<sup>16</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90-97。

有助于笔者的论文书写，口述者们的“分享”使被隐藏的历史面貌得以逐一拼凑。除了中文文献，笔者也搜寻到了有关“五一三”的英文和马来文资料，如由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写的“*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和“*13 Mei Sebelum Dan Selepas*”，以及由前马来西亚警察与 Leon Comber 所写的“*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前者使笔者得以从前任首相的视角去了解事件，后者则梳理了事件的经过与后果。

此外，华巫人物创伤书写的章节中，笔者初步计划将小节定为三个，即华巫人物的外在创伤、内在创伤和小结。因此，笔者收集了有关创伤书写的期刊论文，如贺江的《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王欣的《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赵雪梅的《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等，三者都为笔者清楚解释了创伤理论的概念。其中，笔者认为王欣的文章逻辑和排序较为清晰，细致地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视角去分类创伤。打个比方，文章提及历史性创伤是特殊且一般是人为的，包括大屠杀、种族隔离等，而创伤又可以分为个人和集体创伤，集体创伤不仅指具有同样创伤经验的群体，如战争、大屠杀，也可能指代和代之间创伤经验的传递。家族历史的传递保存了创伤的相关体验和认识，成就了下一代的身份构成与自我认知，并将文学写作、电影等作为基础，刻画遭遇创伤的人物，重现过去，使创伤成为一代人或集体共同拥有的记忆。文章里种种类似的概念解释，在笔者看来皆可以与《蜕》进行挂钩。然而，以上所提及的期刊论文并未提供笔者准确的书写方式。因此，笔者又收集了一篇由藉晓红、贾青云所写的《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女性创伤叙事》，此文亦是从创伤理论视角切入，探讨主角的创伤、觉醒、救赎和复原等。同样的，李树枝的期刊论文《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

指涉意涵》中对创伤文学叙事的隐喻<sup>17</sup>，也成为了笔者的借鉴。此外，娄尚的硕士学位论文《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及影响研究》也是笔者的参照资料之一，论文排序整齐，清晰梳理了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五一三”的原因、过程、影响，<sup>18</sup>或许能够为笔者提供借鉴。

另外，《蜕》的意象书写方面，笔者目前并未找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唯有尽力搜寻一些能够进行挂钩的文献。关于意象的概念，笔者在陈持的《论刘以鬯小说意象技巧的运用》中获得了具体的解释。文中写道，意象是一种通过作家的选择，注入了其感情色彩及主观意识的客观物象，是意识和形象在某种特定时刻的浓缩。文章也提及了西方的象征概念，比如意象是“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他们主张作家以鲜明的意象去表现情感，并将感触、情绪都隐藏至具体的意象背后。<sup>19</sup>笔者还找到了一篇由王晶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毕飞宇小说意象研究》，文中提及了蝴蝶和蛇的意象与意涵，<sup>20</sup>而这些动物都有出现于《蜕》中。关于蛇的意象研究，笔者也找到了李会芹的《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蛇”意象解读》<sup>21</sup>，文中对蛇意象的解读为笔者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

###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选择《蜕》具体有三个原因。其一，2023年新出版的《蜕》研究资料极少，使笔者产生了兴趣。虽然资料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论文书写较为困难，但笔者希望能

---

<sup>17</sup>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页134。

<sup>18</sup> 娄尚，《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及影响研究》（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页40-43。

<sup>19</sup> 陈持，〈论刘以鬯小说意象技巧的运用〉，《名作欣赏》2019年第30期，页30。

<sup>20</sup> 王晶，《毕飞宇小说意象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22），页31-33。

<sup>21</sup> 李会芹，〈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蛇”意象解读〉，《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页164-166。

够通过对小说的探讨，加以自身的理解，尽可能带出作者想通过文字传递的思想。其二，来自于好奇心的驱使。《蜕》的核心内容是“五一三事件”，而这段历史早已过去五十余年，是什么原因驱使非事件亲历者的贺淑芳再度提起？其三，决定研究《蜕》前，关于“五一三”的种种，其实也只是略有耳闻，对事件真正的经过是难以想象的。《蜕》的出现补充了笔者的“记忆”，其中的创伤叙事为非亲历者提供了事件发生的真实画面。

因此，本论文的题目将拟定为——论贺淑芳《蜕》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并主要处理两个问题：

其一，贺淑芳是否成功在《蜕》中书写出华巫人物的外在和内在创伤？《蜕》是否为人们还原了碎片化的历史画面？《蜕》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

其二，贺淑芳于《蜕》中如何书写动物和人物意象？作者所运用的意象在小说中起到了怎样的效果？

#### 第四节、研究范围

《蜕》共有两个版本，一是由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发行，其中序文由上海复旦大学博士黄琦旺所写；二是由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其中序文由台湾国艺会董事长林淇濂、台湾作家张亦绚、台湾小说家童伟格所写。两者的序文内容都十分有见地，或许会对笔者有所帮助，因此本论文将共同引用两本《蜕》，并将重心置于：

其一：着重探讨《蜕》中的华巫人物创伤书写。贺淑芳将华族和巫族在“五一三”中遭受的外在及内在创伤描写得极为细致，使读者印象深刻，故此部分内容将主要书写小说中华巫人物所遭受和遗留的创伤，并借此分析作者创伤书写的原因、价值和意义等。

其二：着重探讨《蜕》中的人物和动物意象书写。贺淑芳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些特殊的人物，如未、半边人和杜丽娘，以及将动物，如虱子、青蛇、蝴蝶、螃蟹和蜘蛛作为小说标题，使两者成为携带着某种特殊意涵的意象，让读者备感兴趣，故此部分内容将主要尝试探讨出作者想借两种意象来表达的深层意涵。

## 第五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采用五种研究方法，分别为文献调查法、文本细读法、社会历史批评法、文学创伤理论研究法、读者批评法等来对《蜕》进行探讨。

其一，文献调查法。笔者将通过努力搜寻线下图书馆或书局，找出合适的参考书，并将它们运用其中。打个比方，笔者将使用《文学批评原理》《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等，以其中的资料与《蜕》进行对照。同时，笔者也将善用网络资源，如运用中国知网来搜寻有助于本论文的资料，以上所使用的《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便是例子之一。

其二，文本细读法。细读法，指的是一种由新批评所创造的具体批评方法，其建立在对文本语义进行精密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作最细致的分析。阅读过程中，研究者需以“放大镜”的方法去解析作品中的词句，尝试捕捉词句中所蕴含的言外

之意。<sup>22</sup> 为此，本论文将运用文本细读法来对《蜕》进行详细的阅读，进而再探讨作品里的华巫人物创伤和意象书写。

其三，社会历史批评法。《蜕》主要以平民百姓的见证、经历组构而成，从他们的视角去叙述马来西亚历史事件，即“五一三”的具体情况。因此，重视且会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行具体阐释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相信适用于《蜕》。社会历史批评法，指的是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去观察、解析文学现象的一种方法，它将重心置于研究文学作品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注重作家的思想倾向及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用。社会历史批评一般认为，文学是时代、种族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文学无法抽离社会历史，它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sup>23</sup> 换言之，文学作品《蜕》与社会历史批评法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社会生活（五一三事件）的空白。同时，笔者也会结合“文史互见”的方式，借用有历史事件内容的文学、史学等相关书籍，去研究和填补历史缝隙，彼此相互对照。<sup>24</sup>

其四，文学创伤理论研究法。创伤（Trauma）一词，本意指由外部力量对身体所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后来更多指向精神层面。<sup>25</sup> 创伤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分不开，两次的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暴行成为了创伤研究出现的契机。<sup>26</sup>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了人类创伤的各类因素与后果，如人会因受惊、受伤而产生创伤，创伤则带来了重复性的后果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伤研究开始由精神分析

---

<sup>22</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53-154。

<sup>23</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页69-72。

<sup>24</sup> 郭敏，〈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页54。

<sup>25</sup>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页132。

<sup>26</sup>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页202。



学、心理学渗透到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的研究，当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创伤小说”。<sup>27</sup>笔者认为《蜕》可以被归类为创伤小说，书中刻画了华族被屠杀的残酷、身体创伤的磨难，人物心理的分裂、生活的改变也从侧面透露出了创伤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同时，创伤小说一般提供“某个人物”的遭遇画面，但实则是在表现“某个人物”其实是“每个人”的形象，《蜕》亦是如此。因此，笔者将会在本论文里运用文学创伤理论研究法来分析《蜕》中的创伤叙事。<sup>28</sup>

其五，读者批评法。文学主要以四种基本要素构成，即作品、作家、世界及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读者批评主张从读者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其意义。读者批评认为，读者是文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他们可以在阅读活动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某种程度上是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及创作。笔者认为，读者批评法中的“发现空白”适用于探讨大多文学作品，《蜕》也不例外。发现空白指的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读者创造性的体现，被探讨的文本将在读者的创造性重构下迈向丰富及开放。读者可以发挥想象，将文本中隐秘的人物、跳跃的情节等进行分析，获得一种创造的快感，也为文本带来新的透视角度。打个比方，《蜕》中出现的动物意象，如虱子、蝴蝶等，以及特殊人物意象，如半边人、杜丽娘等，作者都并未提供他们存在的准确意义，而这些皆可以由读者来进行思索。因此，笔者也将以读者批评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在阅读与理解《蜕》后，再适当地结合自身的分析。<sup>29</sup>

---

<sup>27</sup>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页 133-134。

<sup>28</sup>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页 149。

<sup>29</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页 187-196。

##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本论文在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的初步研究成果有：

其一，华巫人物创伤书写方面，《蛻》以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萝等华族以及贾米尔的哥哥、父亲、雅各等巫族人物为读者还原了暴力现场的画面，也展示了人物遭遇创伤的严重性，小说想借此传递的是，创伤难以痊愈，走向疗愈的第一步不是压抑，是述说。

其二，意象书写方面，《蛻》借未、半边人、杜丽娘等人物意象以及虱子、青蛇、蝴蝶等动物意象寄托了作者的神思，由此反映出国家对真相的封锁已然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了国家、种族、关系之间的残败。

## 第二章 梭子之声：《蜕》华巫人物创伤书写

创伤，原指由外部力量对人类身体所构成的物理性伤害（肉身损伤），但后来更多指向了精神层面（心灵伤口）。创伤理论化的研究离不开弗洛伊德，他将创伤定义为，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内，心灵突然受到一种极高度的刺激，导致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寻求适应，从而造成心灵分配的有效能力遭到永久破坏。<sup>30</sup> 创伤可以是特殊、不可避免的重大暴力事件，<sup>31</sup> 其呈现的形态具有多样性，如往后会以延宕、重复等方式再现。人们在突然经历灾难性事件时，巨大的冲击致使大脑在当下感到麻木，导致对事件的反应是无法及时理解，也就造成后来出现恶梦、幻觉等现象反复侵入，此为创伤后的心理状态。<sup>32</sup> 同时，创伤也是不可言说的，在遭受伤害后，受创者或许会体验到用语言来表达痛苦的困难，创伤的“不可分享性”使语言被抗拒。然而，创伤能否痊愈，很大关键在于倾诉，故此就需要一种能够描述痛苦（创伤）的语言出现，而文学就成为了言说（治愈）创伤的希望。<sup>33</sup>

《蜕》以“五一三事件”为主题，成功“重返暴力现场”<sup>34</sup>，书中勾勒出不同人物的创伤，无论是罹难者或幸存者，华族或巫族，皆在事件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外在和内在创伤。《蜕》属于虚构小说，书中人物可以是虚构，经历和创伤却是真实的，创伤叙事中虽然只提供某些人物的遭遇，但他们往往是“每个人”的代表形象。贺淑芳借由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等主角的视角，以繁复、碎片、拼接式的方法将人物的创伤心理呈现出来，反映出人们所遭受的伤害。由此，《蜕》成了“梭子之声”——使无法言说的创伤（历史）得

---

<sup>30</sup>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页 132-133。

<sup>31</sup>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页 139。

<sup>32</sup>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页 146。

<sup>33</sup>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页 205。

<sup>34</sup>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页 137。

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言说。“梭子之声”是一个由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提出的经典隐喻，其精简了菲罗美拉遭遇强奸和舌头被割掉的故事。她为了回应所遭受的双重创伤，织了一条毯子来描写被强奸的事，由此被割掉的舌头得以复原，“梭子之声”成了她的声音。换言之，“梭子之声”指的是，使无法言说的创伤得以言说。<sup>35</sup>

## 第一节、外在创伤：罹难者与幸存者

“外在”，指的是表露在外的，如环境或外部形象等。<sup>36</sup>《蜕》中，人物不仅经历了可见的、具体的肉身创伤，也经历了不可见的、抽象的心灵创伤，笔者将前者归类为外在创伤，后者为内在创伤。本篇将主要先对《蜕》中华巫人物的外在创伤进行书写，并将遭受外在创伤的人物分为两类，即罹难者与幸存者。

1969年5月13日，地狱降临人间，暴力席卷吉隆坡。

《蜕》中有许多人物在暴动当天就遭遇不测，如叶阿清的好友——友梅便是其中之一。阿清和友梅从小交好，打从十岁开始，两个女孩就会为了节省时间一起洗澡，可见关系之亲密。事发当天，阿清因后天要去表姐的婚礼当伴娘，不顾车间小组长和友梅的劝阻，坚持要去陈秀莲路取送去修补的鞋子。心心念念的鞋子并未拿到，她们超捷径走去陈秀莲路时，就不幸碰上了爆炸。阿清跑得腿和踝都要断了，在混乱中跌入沟渠，失去意识，再次醒来时人已在医院，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她是“从地狱回来的”<sup>37</sup>。阿清是“五一三”幸存者，除了肩膀、耳朵、大腿有些磨损的皮外伤，身体并无其余大碍，但友梅却再也无法

---

<sup>35</sup>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页 205。

<sup>36</sup> 〈外在〉，汉典，2024年3月13日，<https://www.zdic.net/hans/%E5%A4%96%E5%9C%A8>。

<sup>37</sup> 贺淑芳，《蜕》，页 39。

回来。<sup>38</sup> 根据《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个人口述叙事》的记录，部分口述者曾提及在暴动后，警方那里多了一本“相簿”，如〈相簿〉中的口述者表示，戒严几天后，他们有位当警察的姨丈带着一本厚厚的“相簿”登门造访，里面摆放的都是由警方所拍摄的罹难者遗照，<sup>39</sup> 而小说中友梅的母亲，亦是从警察提供的照片上找到了自己的女儿——“阿梅头脸都是血污，半边脸磨完”。<sup>40</sup>

根据“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数据，暴动期间至少有 753 所建筑物被烧毁或摧毁，<sup>41</sup> 相信其中也包括陈桂英在蕉赖的外婆家，也即叶金英的娘家（此处以陈桂英的视角为主）。发现外婆家被烧毁时，已是暴乱发生的第八天，外婆（翁亚玉）的尸身窝在已然侧翻的躺椅扶手边，被大火侵袭过的身体变得瘦小而焦黑；<sup>42</sup> 外公（叶有义）不常呆在家，平时会外出和朋友抽烟赌博，事发当天却没有出门，或许是在客厅，也或许是在橱柜旁被砍、被烧；<sup>43</sup> 两个小侄女，一个九岁，一个八岁，和母亲（舅母）相拥，即使幼小、手无寸铁都依旧被砍和烧；大舅倒在前厅，或许是曾有过极激烈的反抗，他的死状最为惨烈，似乎凶手最恨他，不仅剃过，也被烧至焦肉翻起，露出白色的骨骸，陈桂英一家在辨认尸体身份时，都是依靠着大舅手上的婚戒才认得，一移动尸身手指就掉落，<sup>44</sup> 叶家几乎全家身亡，只剩下母亲叶金英、排行第七的阿清姨和阿安三舅<sup>45</sup>，这对他们一家必然是巨大的创伤。

---

<sup>38</sup> 贺淑芳，《蜕》，页 32-40。

<sup>39</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100。

<sup>40</sup> 贺淑芳，《蜕》，页 40。

<sup>41</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8。

<sup>42</sup> 贺淑芳，《蜕》，页 24。

<sup>43</sup> 贺淑芳，《蜕》，页 40。

<sup>44</sup> 贺淑芳，《蜕》，页 24。

<sup>45</sup> 贺淑芳，《蜕》，页 39。

除了叶家与陈家，小说中遭遇严重外在创伤的人物还有〈宋红欢与宋万波〉里的宋万波。宋万波出生于暹罗（泰国）南部的宋卡，属于泰国华侨，但因生活在马来西亚，经历过“五一三”，与马来西亚华族有着相似的背景，因此也可以归类其中。事件中，政府曾发布从五月十三日至七月初期间，当局共逮捕了 8114 人，被拘留者大部分罪名为散播谣言、触犯戒严令、私会党等，<sup>46</sup> 这数字里，宋万波被迫当了一个。暴动开始到戒严结束，宋红欢再见到宋万波时，已经是九个月后的事，再见他的那日是个阴天，云层很厚，即使隔得很远，她都一眼看出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宋万波脸上多了一道很长的疤痕，从左眼角延伸至鼻翼，触目惊心。他背挨了鞭笞，疼得发抖，辛辣刺激像泰式酸辣面之类的食物都不能吃了，一吃就咳得厉害，还会漏尿，走路一拐一拐，变得很瘦弱。腿脚的不方便让宋万波没办法再爬高爬低，水泥工做不来、油漆工做不来、夜总会做不来，只能去驾德士，驾照都是别人的，生活变得需要走一步看一步。一年的时间，一次的经历，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他的生活被“五一三”剥夺了。<sup>47</sup>

显然，暴动期间，大部分的伤亡者都是华族。即使政府当时通过掌控《南洋商报》或《每日新闻》来公布的伤亡数据不具备性别、族群、身份，<sup>48</sup> 但《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已大致揭露真相——5 月 14 日，中央医院停尸房的 77 具尸体，其中大约有 66 具是华人的；<sup>49</sup> 5 月 17 日，警方预估死亡人数已达 100 人，但真实数字显然更高，而在比例上，华人伤亡人数比马来人高得多，猜测二者是 85 对 15（英国最高专员署的报

---

<sup>46</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244。

<sup>47</sup> 贺淑芳，《蜕》，页 47-65。

<sup>48</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 242。

<sup>49</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41。

道)。<sup>50</sup> 1969 年的暴动,是那些搞政变的政客指使马来暴徒所造成的“杰作”。然而,并不是每个巫族都是加害者,也有一些奉公守法的马来同胞很不齿那些马来流氓的行径。<sup>51</sup> 刀枪无眼,华族在暴动中受到伤害,巫族必然也不会毫发无伤,而《蜕》中贾米尔(Jamil)的哥哥就极有可能是“五一三”的罹难者。〈的加巫〉中写道,贾米尔认为,他、母亲和邻居,皆是“从遗忘的毁灭中,幸存下来的人”<sup>52</sup>。“五一三”一般被视为禁忌,人们必须将之遗忘,否则将会不利于种族和谐,故“遗忘的毁灭”指的可能就是“五一三”,贾米尔、母亲和邻居是幸存者,而哥哥并不在其中,小说紧接着就提到了哥哥的离世,更是证明了他是罹难者。哥哥去世时,贾米尔只有七岁,当时大人们从油棕园的沟渠里找到他,他全身沾满泥泞,所穿的校鞋损毁严重,其中一只鞋头裂得像张大口的鳄鱼嘴,或许正是因为躲避或遭受攻击才会导致跌落沟渠,鞋子也被磨损得破烂不堪。<sup>53</sup>

## 第二节、内在创伤：无法痊愈的伤痕

王德威在《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中写道,伤痕是一种记号,指的是身体经过非自然的割裂或暴露,最后又得以弥合的痕迹。然而,即便伤痕得以痊愈,只要痕迹存在,人们就会不自觉记起发生过的暴力。伤痕是一种肉体证据,证实身体曾受过侵害,它指向时间的流程和一个矛盾的欲望——既想要抹销,却又不断重访暴力现场。<sup>54</sup> 《蜕》的“五一三”叙事正是一种记号,揭露事件虽已过去五十余年,创伤已然结疤,但历史的

---

<sup>50</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48。

<sup>51</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页 55。

<sup>52</sup> 贺淑芳,《蜕》,页 247。

<sup>53</sup> 贺淑芳,《蜕》,页 248。

<sup>54</sup> 王德威在《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页 1-2。

封锁导致真相始终无法厘清，心结无法解开——因此，当再度瞥见伤痕，即使是“封冻的伤疤，原来也会痛楚燃烧而融化”<sup>55</sup>。

梦，一般被认为由某种愿望引起，是思想在借用幻觉经验以表示愿望的满足。<sup>56</sup>然而，对创伤患者而言，梦并不等同于愿望，某些患者会在梦境中再次经历创伤。创伤之梦的回归并不出自于患者的意愿，它超越了个人的愿望和掌控，它一般具备重复的特征，会将创伤患者重新带回曾遭遇的境况，使患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惧中醒来。于是，这种梦也可以被称为恶梦，而这类闪回的发生则是因为患者的脑部丧失了躲避的能力，他们无法给予创伤事件任何心理上的意义。<sup>57</sup>《蜕》中出现的恶梦不少，叶金英在娘家人去世后就梦到了火，她梦到女儿们的脸、妹妹的小说和哥哥被烧。正煮饭，房子出现一片烧着的冥纸掉她手臂上，挥一挥手火竟跑去烧窗帘。场景一转，她又回到老家，正等吃饭时，外面开始有人用刀在烧屋里来回砍人。<sup>58</sup>叶金英关于火的梦，反映出她对被大火烧死的家人始终无法释怀，近乎全家的惨死来得太突然，让她难以承受，一开始的她无法理解事情的发生，所以才会有之后的她“穿越”回娘家，再一次经历且参与了家人所遭受的暴力。创伤一方面是与死亡的相遇，一方面又是不断幸免于难的经历，作为幸存者，叶金英并没有逃脱死亡的追逐，家人惨死的事实所带来的震惊不断返回来追逐她，在她心里形成了一种内在创伤。她不再是从前的她，以往生活的忙碌会让她迅速入睡，暴动后她总是生活在恐惧中，大脑再也不会屈服于疲惫的身躯，夜晚碰上家里有人下楼上厕所，她更无法入眠，她要等出去的人回来后起身重复检查门锁好几次，深怕又突然发生暴动，带走她身边的一切。她变得

---

<sup>55</sup> 贺淑芳，《蜕》，页 141。

<sup>56</sup>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 333。

<sup>57</sup>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页 147。

<sup>58</sup> 贺淑芳，《蜕》，页 30。



对许多事情都很恍惚，就“好像心跟身断了，好像灵魂被斩，魂魄不齐”。<sup>59</sup> 小说中的种种迹象都透露出叶金英在事件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是肉体的、外在的，而是心灵的、内在的。

同样作了恶梦的还有陈桂英。暴动发生至第三、第四晚，气氛依旧紧张，到处都有枪声，陈桂英一家不敢靠近窗口，尤其看见住同一层楼的工人死在楼下大门，尸体都捡不回，更让他们感到害怕。在如此压抑、紧张的氛围下，陈桂英晚上梦见全家人在逃亡，沿路有断臂、断头，面前有一堵墙阻挡去路，她不断爬至手指出血，还在梦中遇见剖腹跌肠血淋淋的熟人。崩溃大哭时，她见到了观音菩萨，观音送给她一枚桃子，但她却来不及接手就醒了。陈桂英和叶金英一样，在亲自经历“五一三”以及意识到失踪的弟弟国豪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后，压抑的氛围让她无法承受，于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创伤，而创伤通过恶梦的形式再次回归。<sup>60</sup> 值得一提的是，陈桂英的梦出现了观音，在民间传说中，观音经常以各种化身解救众生，一般人们在遇到烦恼、苦难时，都会祈求观音的解救，<sup>61</sup> 而桂英也是如此。或许是在现实中感到绝望，认为没有人可以解救他们，所以梦中才会出现代表着化解苦难的观音，由此反映出她内心极度渴望可以早日逃脱令人恐惧的暴乱，但她的愿望显然在现实中没有成真，梦中观音所赠送的桃消失，表示了她的无法逃（桃）脱。

叶阿清则与叶金英和陈桂英截然相反。暴动发生后，她一直无梦，更准确来说是对自己做过的梦失去印象。笔者认为，无梦的原因或许和心理学上“创伤健忘症”的概念有一

---

<sup>59</sup> 贺淑芳，《蜕》，页 31。

<sup>60</sup> 贺淑芳，《蜕》，页 23。

<sup>61</sup> 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页 33-34。

定关联，即患者在经历创伤后可能会遗忘创伤，<sup>62</sup> 就正如叶阿清所言，也许是太过伤心，身体无法承担过重的忧郁，创伤患者光是记住伤心的事和梦，就已经耗尽他们的力气，脑袋无法记挂过去，也就连带着无法再接通梦的通道。<sup>63</sup> 相较于其他人物，叶阿清的内在创伤似乎更重一些，不仅要承受近乎全家的惨死，更要因为友梅的死而自责一辈子。暴动后阿清哭不出来，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不出话（也可以看作是创伤无法言说）。<sup>64</sup> 面对重大意外时，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能够悲伤算是幸运的，至少能稍微释放情绪，而那些看似冷淡、麻木的人，实则是因为创伤太大了，已经超乎可以承受之重，才会连悲伤都凝滞了，无法宣泄出来。<sup>65</sup> 叶阿清开始害怕孤独，她无法再恋爱，无法再感到快乐，她感觉死去的是她自己——“死亡就在我里面，像颗种籽”<sup>66</sup>，她需要让工作占据时间，让黑暗无法侵蚀她。叶阿清的创伤从外在延续到了内在，并且总是携带着浓烈的愧疚感。友梅去世前，她就曾妒忌友梅和阿海的两情相悦。友梅并不知晓，她对阿清依旧很好，暴动当天她不放心阿清独自一人去取鞋，但最终却是她失去了性命。在叶阿清心里，她不仅妒忌最好的朋友，甚至还间接害死了友梅，这份自责和愧疚将如同幽灵般伴随她一生，〈Tempe〉中已然证实。即使事情过去很久，她都结婚生子了，但再次提到友梅，就算不是她所知道的友梅，阿清都依旧无法抑制自己内心深处的悲伤，她这些年来所经历的日子、时间都像纸一样，一下子就窿裂撕开了，过去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过去。<sup>67</sup>

---

<sup>62</sup>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页 204。

<sup>63</sup> 贺淑芳，《蜕》，页 70-71。

<sup>64</sup> 贺淑芳，《蜕》，页 40。

<sup>65</sup> 本刊编辑部、苗嘉琳、熊 LALA，〈“心”的守护者——创伤后应激反应〉，《中学生博览》2021 年第 12 期，页 9。

<sup>66</sup> 贺淑芳，《蜕》，页 74。

<sup>67</sup> 贺淑芳，《蜕》，页 206-208。

创伤的呈现方式是多样性的，其中也包含了创伤的不可言说，即创伤患者可能会无法确切地描述他们所经历过的创伤。〈赊账簿〉中体现出了创伤的不可言说，陈桂英点明了“五一三”罹难者家属或幸存者的共同想法及行为——每逢大选都要囤粮，如米、面、罐头等，她们害怕大选期间出门，她们害怕告诉别人，外婆、外公、阿姨、舅舅是怎么死的，她们不敢哭，害怕别人注意到她们的创伤，她们怕老师提起，却又恨老师不敢提起。<sup>68</sup>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风〉，聊天过程中，美姬向桂英分享了许多家里的情况，但桂英却始终很沉默。她也有无法述说的过去，但不知为何，她不会跟美姬分享太多，更不会提及自己是“五一三”幸存者。<sup>69</sup> 对幸存者而言，即便事件发生已久，却至今依旧无法轻易地说，它“已经结束”或“已经事过境迁”，<sup>70</sup> 要轻松地向别人倾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从理论上讲，想要用语言来表达痛苦（身体或精神的）会出现一种阻碍，因为痛苦一般是“不可分享”的，它会通过对语言的抗拒来确保它的不可分享性，所以才会出现创伤的不可言说。<sup>71</sup> 幸存者的心理总是很矛盾，正如桂英所言，她们害怕别人提起，又害怕别人不提起。前者或许是因为造成创伤的事件，往往既突然又携带着羞辱、欺侮，它们无法被立刻处理，也无法被轻易讲述；或许是因为如此重大伤害的回忆，再度提起就如同撕开已然结痂的伤口；或许是因为“讲了也于事无补”<sup>72</sup>；又或许是因为政府有意无意的“提醒”——“别跟记者、别跟什么人说你们家的事情”<sup>73</sup>，导致幸存者产生恐惧，而后者的出现，就诚如《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中的口述者黄永发所言：“…如果再说，

---

<sup>68</sup> 贺淑芳，《蜕》，页 99。

<sup>69</sup> 贺淑芳，《蜕》，页 167。

<sup>70</sup> 贺淑芳，《蜕》，页 100。

<sup>71</sup>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页 205。

<sup>72</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86。

<sup>73</sup> 贺淑芳，《蜕》，页 99。

历史就没有（这段记录）了”<sup>74</sup>。历史需要真实，罹难者需要公道，幸存者需要交代，重提与处理历史自然也就成了必要的事。

巫族方面，小说以幻觉无法控制而不断侵入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内在创伤，主要体现在贾米尔的父亲和雅各。贾米尔的父亲在小说里的出场时间不多，透过雅各的回忆——某次，那朋友突然对他说，这件事不对，早知道不该去，杀人会有报应的，不难看出，贾米尔的父亲是“五一三”行凶者之一。<sup>75</sup>《蜕》中的华族和巫族并不一样，华族大部分是受害者，他们的内在创伤一般以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的视角呈现，而巫族除了是幸存者，他们也是加害者，无论是贾米尔的父亲或雅各，二者都曾是“五一三”的行凶者，他们都杀过人，内在的创伤也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所谓加害者或行凶者，其实并非将暴动的罪名完全安置在巫族身上，根据“五一三”的伤亡数据，华族的伤亡人数确实比巫族高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巫族对华族的大屠杀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政治人物，百姓大多是受害者，巫族对华族行凶或许是源于政府的煽动，再加上害怕华族执政会重演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事件<sup>76</sup>，从他们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为了捍卫自己，暴动期间也有华族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反抗、杀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有相似之处。况且，伤害他人对普通人来说终究是十分恐怖的事，行凶者如贾米尔的父亲、雅各，心中其实也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雅各最后的时间〉中，通过雅各向儿子的提问——“**错的事哪里会有一大群人一起做呢？**”<sup>77</sup>便可知晓，其实雅各内心深处也清楚，本身就是错的事，集体杀戮，就算许多人一起做，它也不会成为一件正确的事。雅各的内在创伤在暴动后也出

---

<sup>74</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86。

<sup>75</sup> 贺淑芳，《蜕》，页253。

<sup>76</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212。

<sup>77</sup> 贺淑芳，《蜕》，页250。

现了，他的生活开始出现幻觉，家里被一些黑黑、灰灰的人入侵了，这些影子会在他喝完咖啡后问他，是不是又喝神水？打火机点不着烟时会告诉他，直接淋点火水更容易。上完厕所要去洗手时也会告诉他，不用浪费水了，洗不掉的。一开始他将沾满汗水、血迹的衣服当作胜利品般挂墙上，后来他发现墙颜色变深了，那抹痕迹一直盯着他，最终竟挣离板墙，活了过来。影子们如影随形，他感到很压力，一直都睡得不安宁。〈天使簿〉中，雅各死了，即便一开始依旧不肯面对自己做过的错事，依旧讨厌华人，但他发现越是恨与嫉妒，他的灵魂就越深陷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唯有面对，感到悔恨，真心去忏悔，灵魂才会松脱，心中的愧疚、创伤才会真正地痊愈。<sup>78</sup>

### 第三节、小结

从人物的外在创伤延伸至内在创伤，表示了创伤具有延续性。创伤究竟有多长？又是到何时可以痊愈？或许萝可以稍作解答。萝是相对比较贴合当代人的角色，她没有经历过“五一三”却承受着它所带来的后难，不是流血意义上的，而是它对国家、种族、关系的损伤，从学校决意请巫族来教汉语的事件上看，萝如今的愤怒和当年经历暴动后被压抑情感的人是平行的。她并未亲历过现场，却如同在场，可以说她的生命有多长，“五一三”所带来的创伤延续性具体就有多长。<sup>79</sup> 如果没有妥当处理，创伤甚至会更绵长，而只有当人的声音变得可见，一种缓解痛苦的通道才会浮现。贺淑芳曾道，语言有代替行动的意义，言说就是行动，“梭子之声”是将绝望转为希望，赋予文学艺术言说创伤的机会，而这也正是《蜕》存在的意义。“五一三事件”几乎不可触，除了官方论述外，它没有被公开讨

---

<sup>78</sup> 贺淑芳，《蜕》，页 250-260。

<sup>79</sup> 贺淑芳，《蜕》，页 16-20。

论过，讲故事的似乎永远只有一方。政府靠着全民大团结的借口遮掩下，不公开官方档案，不还原历史，不曾归还真相和公道于人民、幸存者，甚至是罹难者，他们总是持着任何人都 不应该去揭“五一三”伤疤的想法，认为没有再对话的必要性，却始终忽略了受害者遭遇重创的心。无论是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友梅、宋万波、雅各、萝，皆是通过小说以虚构之身指向真实历史，他们无一不在述说着——即使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但他们的伤口并未得到妥善的处理，他们的创伤始终无法痊愈，而《蜕》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的创伤或许可以回收了。贺淑芳通过文学的方式，成功让受害者有一个可以述说痛苦的通道，拥有重新诠释创伤的机会，也为不曾在场的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出被封尘的历史真相，《蜕》不仅仅是一本小说，也是一份对历史承担的觉悟，更是创伤走向疗愈的第一步。<sup>80</sup>

---

<sup>80</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页 9-11。

### 第三章 作者之身：《蜕》意象书写

贺淑芳曾言，一部小说的内容往往会交织着不同的观点，也包括作家自身的观点（文学介入），小说（文本）基本上是作家所组装而成的“身体”，是另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身体”。

作家自身的观点可以由各种方式在小说里呈现出来，意象是其中之一。所谓意象，分为“意”和“象”，前者指主观情感，后者指客观景物，两者交汇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文学美，<sup>81</sup>“象”基本上是“意”的寄托物，是内心的“意”借助外在的“象”来表达情感。<sup>82</sup>意象具有双构性，即表象和意义，表象是作家在大脑形成的形象，创作过程中，原有的表象经过作家的选择和建构，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意象不单是某种意义与表象的简单相加，它在汇集过程中融合了作家的神思和才学意趣，从而使原本的表象及意义产生变异和升华，成为了一个可供人反复寻味的特殊存在。意象一开始广泛运用于诗歌领域，但随着发展不再局限于诗歌，并逐渐进入叙事性的作品，如小说中，作家选取意象来建构专属世界，其中隐含着作家的个性特色及独特的审美追求，而意象同样受到了贺淑芳的青睐。《蜕》中出现的意象不少，大致可分为特殊人物及动物意象，这些意象包含了作家的深刻思考，具备多样的艺术功能，是读者通往小说主旨的重要枢纽之一。<sup>83</sup>

---

<sup>81</sup> 黎家恒，《论马华与马来文学的“513”政治抒情诗》（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位论文，2021），页23。

<sup>82</sup> 王虹，《苏童小说意象探析》（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1。

<sup>83</sup> 刘章宁，《表象与意义——论曹文轩小说的意象书写》（济南：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页4-7。

## 第一节、人物意象

马来西亚宽大的国家档案局里，1969年5月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真空导致事件成碎片化，一位作家要想拼凑出暴力现场的画面，用文学来展现人们所遭受和遗留下来的创伤，往往就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并通过各种情感极限的状态来表现。作家一般会通过创新的叙事手法，如时间裂缝、分裂时序、非线性情节、意象等，来强调其思想的混乱、解离、混沌，以作为对创伤经历的回应，而《蜕》也一样。<sup>84</sup>本篇的人物意象指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如未、杜丽娘、半边人等，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作者采用了意象、非线性情节等的手法，只为尽力展现出事件的混乱和自身的想法。本篇旨在通过分析这些特殊的人物意象，尝试解读出作者想借他们来表达的意涵。

三个特殊人物中，率先出场的是未，随后再由未引出半边人和杜丽娘。小说的第四章以倒霉汉“未的故事”开始，未原本和妻子芮莲在新加坡有稳定的工作，却在某次因同车的组长身上携带着共产主义的传单，他受到牵连被吊销工作准证，赶回了马来西亚。暴动发生时，他遇上旧同事请求帮忙搬运一个受伤的伙计，因此经历了枪林弹雨，目睹了华族被巫族砍劈的画面，以及载满尸体、头颅、断胳膊断脚的啰哩，之后又发现妻子似乎返回吉隆坡且失踪了。精神恍惚的他在河边被一个只剩左半边的黑影撞入身体，之后忽然就加入戏班，整个经历就如同在梦中。《蜕》的小说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叙述线一是以虚构的家庭来重组事件，叙述线二则以剧场、梦、幻觉、魔幻等在逻辑界线之外的方法来表达主题和创伤。笔者认为，未加入戏班成为柳生是一场梦，〈杜丽娘〉中多有暗示，如“似乎整个剧团只是杜丽娘作的梦”。<sup>85</sup>“五一三事件”是碎片化的，当叙述者无法深入其境，能

---

<sup>84</sup>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页148。

<sup>85</sup> 贺淑芳，《蜕》，页176-199。



做的就只有像恋物癖般捡拾断肢，以个人审美为缝线，重新组装一个完整的身体（文本）。

《蛻》看似有时间序列的五章，实则是由近四十截的回忆、叙述组装而成，而《牡丹亭》成为了叙述者重装与缝合的语境，她尝试以杜丽娘由生而死，死而又生的故事来隐喻事件中猝死、支离与冤屈的无数身体。<sup>86</sup> 从意象的角度看，未的存在象征着文本的重组——

“未心里有个奇怪的感觉，仿佛他的身体，被这忽东忽西、飞来飞去，捉摸不定的声音给拆过了，又拼回去”<sup>87</sup>，而需要重组的原因，反映出了国家对真相的封锁，导致拒绝悲伤的氛围不断蔓延，人们阉掉感觉，国家变得不允许悲伤，创伤也无从治愈。梦是《牡丹亭》的主题，故杜丽娘的存在是一种梦的象征，隐喻着在现实世界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许只有在梦中才能获得妥善处理，因为梦是创伤密码的结晶。再往更深一层想，杜丽娘“因情生梦”，为了梦中的情，她不懈追求至生生死死、上天入地，<sup>88</sup> 杜丽娘对情的重视与这半世纪都不被允许悲伤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透露出相较于暴动，更残暴的似乎是爱欲的缺失、无梦的人生。<sup>89</sup>

未在河边被一个只剩半边身的黑影撞入身体，此为半边人的第一次出场，之后再见则是在〈第二幕剧：半边人〉。半边人是一个活生生被劈成两半的人，他全身被斩劈得只剩接近下体的部分稍微衔接，原该死了被军人埋在乱葬岗，但他却复活了，并且在军人的追逐之下来到一条分岔路口，最终因左右无法一致而硬生生撕开来，右边往森林跑，突破时空回到过去，左边则往城市跑，许是去了未来。<sup>90</sup> 笔者认为，半边人意象具体有三个意涵。其一，半边人理应是华族，他在暴动当天骑着摩哆，毫无预警被马来暴徒一刀砍成了两半。

---

<sup>86</sup> 贺淑芳，《蛻》，页 7-10。

<sup>87</sup> 贺淑芳，《蛻》，页 195。

<sup>88</sup> 陈文兵，〈梦是梦·梦似梦·梦非梦——论〈牡丹亭〉的梦境描写〉，《四川戏剧》2012年第3期，页 40。

<sup>89</sup> 贺淑芳，《蛻》，页 9。

<sup>90</sup> 贺淑芳，《蛻》，页 269-272。

半边人（华族）的撕裂象征着华人主体被劈开成了前后拉扯的两半，恐惧和沉默致使内里的震荡构成了断层，时空翻了过来，人们都是死过又醒在了全然不一样的人间。<sup>91</sup> 其二，半边人的特征在于“从左边看他，跟常人无异，但从另一边看，就见到人被世界啃过的样子”<sup>92</sup>。遭遇创伤的患者，表面看似完好无损，从另一面（内里）看就会发现，创伤对心理的打击极其野蛮，它会撕裂一个人的防御抵制，人们会感到生活似乎被创伤划分成之前和之后两个区域。半边人象征着每个被“五一三”创伤撕裂的患者，尤其指华族。这种创伤一般会使受创者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创伤的邻域，一个是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很难达到沟通。他们的世界将一直都是双重性且平行存在，创伤也不是历时，而是共时的。患者的记忆会被分裂，日常生活的记忆具有时间性，创伤事件的记忆则无时间性，它无法被大脑认知，无法述说和被理解，创伤经验也因而被凝固在时间里，无法作为过去被再现，而是永远在一种分裂、痛苦的现在中被重新经历。<sup>93</sup> 其三，半边人似乎也带有讽刺性，如他在白垩纪和人类纪后醒来，在洞穴前见到一颗骷髅头坚持又固执的意念——别让华人及印度人来共享我们的国家，别放弃属于我们的特权地位，我们受过华人剥夺的伤，不要让历史重演，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由此透露出了作者对“五一三”，甚至于对政府总是“种族至上”的批判。<sup>94</sup>

---

<sup>91</sup> 贺淑芳，《蜕》，页 6。

<sup>92</sup> 贺淑芳，《蜕》，页 270。

<sup>93</sup>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页 149。

<sup>94</sup> 贺淑芳，《蜕》，页 273。

## 第二节、动物意象

罗·海尔曼（R.B.Heilman）曾言：“几乎全部的动物意象都被用来议论人类，人类的本质和世界上的地位”。<sup>95</sup> 动物几乎贯穿了《蜕》，从小标题直接以动物命名，如虱子、青蛇、蝴蝶、螃蟹、蜘蛛，故事内容中出现了青蛙、鸟等动物，乃至书的取名“蜕”都表示了动物的蜕皮或蜕变。这些动物经过构思，寄托了作家的神思，已然成为一种意象，被赋予了有别于原先的意涵。

〈虱子〉作为第一章，开篇即表明了它的特性——虱子总是出来咬人，时间越久，越杀不死<sup>96</sup>。《蜕》书写公共议题，但更关注“往返于窄巷的日常生活”，书中人物多由底层人民（尤其华族）组成，如干练无休的主妇、车衣工女、赌场杂役等，即使贫困不堪，他们都依旧努力生存着，人物由此对应了虱子，虱子首先是象征着“打不死的华社”。<sup>97</sup> 其次，杨建成曾言，“五一三”基本上是因为华族的政治力量已经从合法途径威胁到巫族的政治特殊地位才发生的<sup>98</sup>，而它也确实成为了马来西亚华族政治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sup>99</sup>。事件后，华族不得不接受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残酷现实<sup>100</sup>，而这也恰恰对应了虱子的寄生特征——“他们是寄居其中的虱子”<sup>101</sup>，虱子实则也隐喻着华族于马来西亚的地位。其三，细小的虱子总是寄生在人类身体的隐秘处，或者毛发的缝隙里，它安然靠着吸取人们的血肉来滋长，驱之不去，死而复生。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竟也就将虱子当成是身

<sup>95</sup> 转引自王晶，《毕飞宇小说意象研究》，页 31。

<sup>96</sup> 贺淑芳，《蜕》，页 20。

<sup>97</sup> 贺淑芳，《蜕》，页 5-6。

<sup>98</sup>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页 237。

<sup>99</sup>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页 135。

<sup>100</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 209。

<sup>101</sup> 贺淑芳，《蜕》，页 67。

体新陈代谢的一部分，<sup>102</sup> 这或许也是在隐喻着虱子和“五一三”的“异曲同工之处”。

“五一三”在受害者心理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只要再度瞥见伤痕，它就会“死而复生”。然而人无法因为创伤而停止生活的脚步，“五一三”和受害者其实就像是虱子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咬人的东西杀不死，就只能强迫自己学会共处，才能继续生存。

青蛇意象出现于小说的第二章，〈冲凉房里的蛇〉中，叶阿清在洗澡时，浴室突然来了一条青蛇，它闪着碧绿幽光，正仰头吐丝，她吓得冲出浴室，最终在阿烈的帮助下，用火炭钳将蛇夹出了浴室，这是第二章里对青蛇的唯一描述。谈及青蛇，笔者第一时间联想到了《白蛇传》。在以往有关白蛇和许仙的许多爱情传说中，白蛇修炼千年，青蛇修炼百年，无论是传说、戏剧、小说、影视等，一般都以白蛇为主角，小青（青蛇）总是屈从于白蛇，她往往都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是用于衬托白蛇的配角。<sup>103</sup> 基于此，青蛇意象其实与虱子意象具有共同点，总是从属于白蛇的青蛇，又何尝不是在隐喻华族在马来西亚也是青蛇一般的配角身份呢？即便华族有所意识自己的处境，想要反抗、争取——“但她们都明白，实际上，在现实里，她们是无法竞争的”。即便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巴士已经从一开始黑人只能坐后面，到现今可以自如上车，就连黑人电影都可以出现，但这里却还是老样子，<sup>104</sup> 华族只要一动弹，基本上就会像那青蛇的下场，被火炭钳夹着丢出去了。<sup>105</sup>

《蜕》的第三章以〈蝴蝶〉为标题。蝴蝶意象向来颇受历代文人喜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因子，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了文人的关注对象，如庄周梦蝶、梁祝化蝶、无数的咏蝶诗等。蝴蝶不仅是一种大自然的生物，也是一种象征物，羽化成蝶的艰辛历程

---

<sup>102</sup> 王德威，〈萤火虫与虱子〉，《读书》2014年第7期，页123。

<sup>103</sup> 聂炎，《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历史家国意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页11。

<sup>104</sup> 贺淑芳，《蜕》，页231-232。

<sup>105</sup> 贺淑芳，《蜕》，页96。

富有美感及崇高的意味，使蝴蝶被看作是灵性的化身，从而也使其意象往往会经过人的精神主宰进行改造和提升，赋予其新的意涵、价值、结构。<sup>106</sup> 《蜕》中的蝴蝶意象与死生相关，〈在场〉里的母亲因暴动而弄丢孩子，在搭火车去寻找孩子的路上车票不见了，剪票员问她要票时，她恍惚间看到一只白蝴蝶，剪票员往票根上打了个洞，“她仿佛看见孩子的灵魂被噬穿了一个洞”。<sup>107</sup> 车票在剪票员或其他人眼里是票，在母亲眼里却变成了蝴蝶，甚至是她的孩子。自古时候，就有出现人在亡故后，其精魂或生前的服饰会幻化成蝴蝶的故事，如李商隐的《青陵台》、薛季宣的《游祝陵善权洞诗》等，<sup>108</sup> 由此来看，小说里的蝴蝶也许是代表着死者（孩子）的亡灵。蝴蝶象征灵魂基本源于人们不认为人死了就会灰飞烟灭，或者如雁过般不留任何痕迹，反而是会变化形态，而蝴蝶的蜕变——由蛹成蝶、幻化重生，就仿佛获得了“永生”，再结合灵魂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永恒、飘摇的，而蝴蝶既漫舞飞扬又扑朔迷离的形态，似乎与灵魂有某种契合点，由此蝴蝶便打通死生阻隔，成为了媒介，所以有时人们看见蝴蝶飞翔，就会不自觉联想到死亡、灵魂。<sup>109</sup> 不难发现，构成化蝶的内在驱动力一般是因为有着难以割舍的至情，如〈在场〉的母亲，因找不到孩子而看见孩子的灵魂幻化成了蝴蝶，并带领她找到一位麻风病人，还一路引到了“五一三”的乱葬岗地点。或许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不能克服、逾越的局限或障碍时，化蝶这一方式就会从想象及幻想的层面，给予人们一种慰藉和补偿。<sup>110</sup>

---

<sup>106</sup> 匡秋爽，《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页78-79。

<sup>107</sup> 贺淑芳，《蜕》，页132。

<sup>108</sup> 匡秋爽，《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页32-33。

<sup>109</sup> 骆雁琳，《论文学作品中的蝴蝶意象》（上海：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页22-23。

<sup>110</sup> 匡秋爽，《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页33-36。

纵观《蜕》用以为篇章取名的动物，虱子、青蛇、蝴蝶、螃蟹、蜘蛛，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动物意象可能产生的一些特殊意涵，其实不难发现，这五种动物是具有共同点的，它们皆是会蜕皮或蜕变的动物。虱子会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发育时期，其中会有三次蜕皮<sup>111</sup>；青蛇（蛇）会为了修复伤口及疤痕、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及细菌等而展开从头至尾的蜕皮<sup>112</sup>；蝴蝶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sup>113</sup>；螃蟹因外壳无法随着身体长大，在成长过程中会进行许多次的蜕壳<sup>114</sup>；蜘蛛也会为了成长而蜕皮。动物蜕皮的过程很危险，它们需要从呼吸器官深处将内膜撕出来，从内脱到外，稍有差错就会堵塞呼吸窒息而亡，<sup>115</sup>但蜕皮或蜕变对它们而言是必然的，只有完成了，它们才能继续成长，变得更强大，也迎接更好的形态。然而，《蜕》中的动物都是属于蜕皮或蜕变失败的动物，它们象征着经历过“五一三”，甚至是后五一三的华族、巫族。直到如今，一切可以被听到的有关“五一三”的故事，都还像对镜孪生般有着另一个完全反过来的版本，华族和巫族似乎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国家制造了一个面具，并死守认为只有他们给的版本才是对的，他们压制了讨论，不追责，不道歉，他们禁止了对真相的探索，也一并封上了原可以让国家、种族、关系深刻蜕变的路。《蜕》之所以取名“蜕”，或许正是想表达，

---

<sup>111</sup> <变态发育>，科普中国，2019年3月23日，

[https://www.kepuchina.cn/wiki/ct/201903/t20190323\\_1029604.shtml](https://www.kepuchina.cn/wiki/ct/201903/t20190323_1029604.shtml)。

<sup>112</sup> <蛇为什么要经常蜕皮？为什么有人说遇到蛇正在蜕皮要倒霉？>，澎湃新闻，2023年11月23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9625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96259)。

<sup>113</sup> 骆雁琳，《论文学作品中的蝴蝶意象》，页22。

<sup>114</sup> <螃蟹长大要脱壳 原来螃蟹是这样长大的>，搜狐，2023年1月31日，

[https://www.sohu.com/a/635793174\\_121147311#google\\_vignette](https://www.sohu.com/a/635793174_121147311#google_vignette)。

<sup>115</sup> 贺淑芳，《蜕》，页219-220。

假设国家依旧强迫人们挤入备好的、不合适的壳里，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蜕变残败的虫子。相反的，假设真相和公道可以出现，所有人乃至国家，都将会是蜕变成功的虫子。<sup>116</sup>

### 第三节、小结

“小说必须拒绝只奏和谐之音”<sup>117</sup>，历史、国家、种族亦是如此。对华族而言，“五一三”多是马来人教训华人的政治事件<sup>118</sup>，它是华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经济权力争夺上大受挫折的起点，它标示着华族从此成为配角的现实。对巫族而言，他们大多认为1969年是站起来争取利益的起点，事件后巫族获得了无数特权。华族和巫族对事件的记忆并不相同，多是受害一方的华族一般会要求翻案、公开、讨论，巫族则大多认为不应该再去揭“五一三”伤疤，过去已经过去，就让痛苦永远离开我们。<sup>119</sup>虽然有时候不去触及负面的记忆，彼此之间或许能够轻松地和平相处，但这跟逃避现实并无不同，逃避并不会让彼此学会度越，更不用谈修复关系。日常生活、报章里的美好话语，虽然善意又和谐，但却忽略了受难者，过于单一的视角，也形成了压抑，或许只有重新触碰那条不和谐的歌弦，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sup>120</sup>

当然，就如同动物蜕皮或蜕变，想要整理过去，治愈创伤，修复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五一三”后，马来西亚出现过明令禁止讨论的法律，资料的匮乏、言论的限制

---

<sup>116</sup> 贺淑芳，《蜕》，页 262-263。

<sup>117</sup> 贺淑芳，《蜕》，页 299。

<sup>118</sup>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一九七八》，页 237。

<sup>119</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 203-219。

<sup>120</sup> 贺淑芳，《蜕》，页 299。

导致有心想处理历史的人很难“秉笔直书”。<sup>121</sup> 正是因为如此，《蜕》中一些无法明说的东西，作者选择了以意象的手法来表达，无论是特殊的人物意象，如未、杜丽娘、半边人，亦或是各种动物意象，皆包含着作者想借以传达的意涵，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成功拼凑了画面、展现出事件的混乱、甚至是控诉，他们都是作者的声音，《蜕》基本上就是贺淑芳亲自创作出来的另一个“身体”。

---

<sup>121</sup> 贺淑芳，《蜕》，页 12-13。



## 第四章 结语

《蜕》是贺淑芳的首部长篇小说，与先前不同的是，她不再受短篇小说的限制，无论是章节设计或语言用词，都显得更肆意绽放。贺淑芳曾言，小说中有许多语言来自受难者家属，她在聆听他们述说事件时感悟，她似乎背负着某种责任，她认为她有必要将受访者的话以某种形式烙印在书中，故《蜕》实则是一种对历史，对“五一三”受难者家属的责任承担。通过对小说中华巫人物创伤及意象书写的探讨，能够深切体会到贺淑芳对“承担责任”的决心，她不顾真相被封锁的艰难，毅然跃入真空的历史里，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才成功以虚构故事来还原时空且复活人物。坚持的动力，或许是源于她了解，创伤的真实在遭遇的那一刻就过去了，只有虚构能让事件归返，受害者才能再度对话，非亲历者才能真正感受事件的苦难。贺淑芳也真正做到了小说必须拒绝只奏和谐之音，她对人物遭受“五一三”创伤后始终无法痊愈的状态进行了真实的叙述，对于一些因规定而无法述说的东西也巧妙运用意象来表达，《蜕》细腻照见了“五一三”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乃至后五一三对马来西亚种族、关系的影响。仔细点说，它是展示了事件的原貌，也隐喻了事件后以巫族为主导的种族政策究竟对马来西亚华族带来了怎样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更重要的是，《蜕》时时刻刻引人反思，自1969年迄今五十余年了，“五一三”何时能真正成为过去？人们的创伤还拥有痊愈的机会吗？马来西亚又是否还会迎来改变的一天？

## 参考文献

### 专书

1. 贺淑芳,《蜕》,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23。
2. 贺淑芳,《蜕》,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
3. 王德威在《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4.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八打灵:文运企业,2020。
6.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7.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 专章

1. 刘雯慧,〈镜子映照的表/背面:论贺淑芳的小说〉,《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369-372。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 译著

1.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2.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八打灵：人民之声出版，2013。

## 期刊论文

1. 本刊编辑部、苗嘉琳、熊 LALA，〈“心”的守护者——创伤后应激反应〉，《中学生博览》2021 年第 12 期，页 9。
2. 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页 32-35。
3. 陈持，〈论刘以鬯小说意象技巧的运用〉，《名作欣赏》2019 年第 30 期，页 30-33。
4. 陈文兵，〈梦是梦·梦似梦·梦非梦——论〈牡丹亭〉的梦境描写〉，《四川戏剧》2012 年第 3 期，页 40-42。
5. 郭敏，〈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第 1 期，页 54-60。
6. 贺江，〈创伤理论与创伤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页 132-136。
7. 蒋成浩，〈马华文学的历史流变与“关键词的阐释边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页 131-138。
8. 李会芹，〈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蛇”意象解读〉，《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6 期，页 164-166。

9.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页134-140。
10. 王德威,〈萤火虫与虱子〉,《读书》2014年第7期,页122-126。
11.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页145-150。
12.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页201-211。

## 学位论文

1. 黎家恒,《论马华与马来文学的“513”政治抒情诗》,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位论文,2021。
2. 刘章宁,《表象与意义——论曹文轩小说的意象书写》,济南: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3. 娄尚,《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及影响研究》,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4. 骆雁琳,《论文学作品中的蝴蝶意象》,上海: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
5. 匡秋爽,《从民间传说到艺术经典——艺术视野中的“梁祝”母题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6. 聂炎,《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历史家国意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 王虹,《苏童小说意象探析》,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8. 王晶,《毕飞宇小说意象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22。

## 网络资料

1. 汉典,〈外在〉, 2024年3月13日。  
<https://www.zdic.net/hans/%E5%A4%96%E5%9C%A8>。
2. 搜狐,〈螃蟹长大要脱壳 原来螃蟹是这样长大的〉,2023年1月31日。  
[https://www.sohu.com/a/635793174\\_121147311#google\\_vignette](https://www.sohu.com/a/635793174_121147311#google_vignette)。
3. 科普中国,〈变态发育〉, 2019年3月23日。  
[https://www.kepuchina.cn/wiki/ct/201903/t20190323\\_1029604.shtml](https://www.kepuchina.cn/wiki/ct/201903/t20190323_1029604.shtml)。
4. 澎湃新闻,〈蛇为什么要经常蜕皮?为什么有人说遇到蛇正在脱皮要倒霉?〉,  
2023年11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9625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96259)。